



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1-13

齐鲁晚报

2020年11月7日

星期六

好 / 读 / 书

读 / 好 / 书

□美编：
编辑：继鹏 红

数千年来，家庭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，也是世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。然而在近代中国，家庭却沦为革命的对象，从清末开始就有人提倡“毁家”，入民国则“家庭革命”的口号一度广泛传播。在新近出版的《家庭革命：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》一书中，历史学博士赵妍杰抛开各类前提、假设和标签，从家庭本身出发，重新审视家庭革命在近代中国的走向。在赵妍杰看来，家庭革命虽更多表现为负面的批判和改革，其实是集破坏性与建设性于一体的，清末民初读书人群体所提出的关于父子关系、自由恋爱、儿童公育的种种设想，今日仍是社会讨论的焦点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

读书人的憧憬

历经了甲午、庚子的战败，救国具有了巨大的迫切性，“国家”“国民”的观念迅速崛起。作为传统中国秩序基础的家庭，首先受到冲击和批判，在“为国破家”的呼声下，家庭沦为革命的对象，甚至提出了“废婚毁家”的主张。

同时，西方的自由平等之说跟随传教士和留学异邦的青年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，进入家庭伦理领域，成为家庭成员关系的新标准。

在激进的年轻人看来，姓氏是家庭和家族最重要的标识，废除姓氏也是脱离家庭的行动之一。

作家章依萍在《枕上随笔》中写道：“中国青年思想，以五四运动前后变化得最厉害。那时的青年，大家嚷着反对家庭，反对宗教，反对旧道德、旧习惯，打破一切的旧制度。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，曾看见一个青年，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，唤作‘他你我’。后来到北京，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一剪发女青年，我问她：‘你贵姓？’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儿，嚷着说：‘我是没有姓的！’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父亲的，说：‘从某月某日起，我不认你是父亲了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是平等的。’”

半带想象的西方家庭方式成为被羡慕的“新家庭”，而中国的家庭则背上了“旧家庭”的符号，受到毫不留情的批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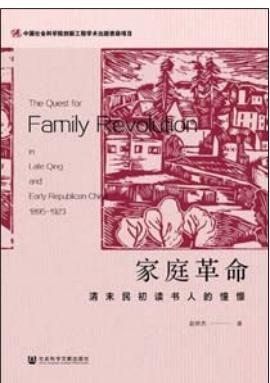
历史学家发现，近代参与讨论家庭革命的人，主要停留在言说的层面，即便高声呼吁家庭革命的人，也多是对他人的号召，自己并未真正具体实践。他们多半已经结婚，家庭出身也比较优裕，并非不能养家糊口或欲结婚而不得的穷苦大众。而受其观念影响的，更多是交际广阔的读书人，“务农、做工的人家”依然极力保持旧家庭制度。也就是说，家庭革命的提倡者、拥护者和追随者，多半是新式学堂成长起来的青年以及能够阅读报纸杂志的人，见诸报端的文字代表着他们的意见，普通民众则处于“失语”的状态。

在赵妍杰看来，家庭革命是近代中国思想激进的读书人在中西竞争的语境下，重置个人与家庭、国家与天下的一种尝试。自幼浸润在儒家经典中、本应视家庭为正面建制的士人，转而攻击家庭伦理，视家庭为桎梏，期望建设无婚姻、无家庭的社会，这种对儒家伦理的自我否定，是中国文化危机的重要表现，而那些改组或取消家庭的设想，就像书名中提到的“憧憬”一词，代表了危机中的读书人不断追寻人生意义和秩序的一种努力。

西方极乐家庭

1915年1月，留学美国的胡适登门拜访卜朗博士夫妇后，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博士夫妇极相得，无有子女，夫妇共持家同艰苦，其相敬爱之深真非笔墨所能写，此真西方极乐之家庭也。”

清末民初，为国破家的家庭



《家庭革命：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》
赵妍杰 著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当家庭遭遇革命：

温暖港湾为何成为『桎梏』

“旧家庭写真”栏目专门刊登“家庭的丑态”，意在“等他丑态百出，名誉破产以后，他们虽然想替家庭保持尊严，谅也没有什么保驾的能力”。原本作为“避风港”的家庭，成为黑暗冰冷的“活地狱”，甚至出现了“万恶家为首”的极端说法。

事实上，西洋小家庭并不是天堂，中国的旧家庭也不是地狱。萧公权曾反思说：“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，但我幸运得很，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。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，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‘择善而从’的机会。因此我觉得‘新文化’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。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至善尽美的，或者也没有一个至丑极恶的。”

具有吊诡意味的是，向西方学习的部分中国读书人视家庭如“牢狱”，西方人却深感社会之冷酷而视家庭为天堂。赵妍杰指出，被中国效仿的近代西方，彼时正处于以家庭为重的时代，其主流是维护家庭的价值。在英语世界流行了上百年的歌曲《家，甜蜜的家》(Home Sweet Home)，其中一句歌词就是：“天下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。”

乌托邦式的工读互助团

钱理群曾指出，在20世纪初的历史舞台上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扮演着“唐·吉诃德”的角色，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部分领导人”和“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”不但梦想要在中国“造一个圆满快乐的黄金世界”，而且，他们“不满足于纯思想领域的鼓吹与批判，他们更重视将‘思想’（‘理想’）变为‘现实’的实践，注重于社会的实际改造（而且是全局的、根本的改造）运动”。

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，大批接受了新思想的新青年开始摆脱家庭的束缚，另谋新生活。然而，从传统家庭出走的新青年却被现实的读书与生计等问题所困扰。针对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，1920年春，王光祈等人在北京召集青年建立“小组组织”，践行半工半读的互助生活，即“工读互助团”。

为了从名义上脱离家庭，团员统统不冠姓，皆以名互称。他们每日必须工作四小时，主要是在互助团开办的印刷所、饭馆、洗衣店工作，或者制作手工艺品。所得归团体公有，而团员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费用、教育费、医疗费、书籍费则由团体供给。此外，工读互助团还尝试把团员的衣服集中分类放置，各取所需，谁爱穿什么就穿什么，不分你我。由此可以说，北京工读互助团既是为了帮助脱离家庭的青年，也是一次废除家庭的社会理想的尝试。

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后，上海、天津、南京、广州等城市也纷纷成立了工读互助团，一时间，运动从北京扩展到全国。

互助团不排斥女性，欢迎女子进团生活，实行男女共同生活，他们因此而认为“无政府、去强权、无法律、无宗教、无家庭、无婚姻的理想社会”终于在团里实现了。意想不到的是，一桩多角恋爱好者使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很快走到了末路。

多角恋事件的当事人——女学生易群先因反对父亲安排的婚姻而出走北京，参加工读互助团。互助团解散之后，她给胡适写信，表达自己的困惑和绝望：“我脱离家庭，不是争人格、谋精神的愉快么？要是得不着好结果，倒不如去做小姐、少奶奶的好先生，对不对？”

在经济困境、情感纠纷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下，不到半年时间，各地的其他工读互助组织也纷纷宣布解散。

关于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本原因，作为团员的施存统总结道：“要改造社会，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，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。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，不能试验新生活。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。”

“不独子其子”的儿童公育

生于世纪之交的梁漱溟，只记得大哥梁焕鼐挨过打，自己则一次也没有过，父亲梁济对他“完全是宽放的”。梁济对子女的不同教育态度，与清末兴起的“破家”之说在社会层面的广泛影响有着很大关系，“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，而云特社会互相监督，人格自然能好”，家庭将培养教育子女的职责推向社会。

康有为曾设想以公立医医院、公立养老院、公立恤贫院、公立养病院、公立化人院等机构将“生育、教养、老病、苦死，其事皆归于公”。向往打破亲疏、打破家庭的青年，希望从全社会、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养老与育幼的责任，实现老年公养、儿童公育。支持者认为儿童公育相比于家庭教育，更能使儿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，培养互助观念，扫除祖先崇拜和依赖家长的恶习，成为“更健康的儿童”；为了实现妇女解放、支持女子从事职业，就要实行儿童公育。

将家庭育儿养老的责任推向社会，家庭革命者更多考虑是安顿和满足人的生理需求，却忽视了亲情对人的重要性。民国著名乡村教育家杨效春批评儿童公育将破坏亲子之爱，它阻止了孩子听到“爸爸妈妈细亮而清妙的和声”，也让父母看不到子女“活泼地天真烂漫的姿态”，这剥夺了人生的快乐。他相信，即便是没有知识的母亲，对自己儿女的疼爱也超过一个陌生的公育机关的专业人员。

施存统以撰文《非孝》痛骂孝道而名扬全国，后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以脱离家庭，而在他的观念里，脱离家庭是“脱离家庭里的名分关系和经济关系，不是脱离家庭里什么人的感情关系”。

周作人在工读互助团演讲时曾说：“我们要宣传我们最好的理想主义，与人的关系，只怕他不多；怎么把关系最亲切的家庭，反而脱离呢？”对此，团员周白棣认为：感情的东西是脱离不掉的，尽管旧家庭不好，“可是我脱离了他，感情之关系，终使心中万分难过”。

倡导家庭革命的人多半面临着情感与理智的煎熬，在赵妍杰看来，家庭的情感要素不可或缺，否定了家庭便否定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，这在大讲感情的五四时代的确是一个悖论，值得反思。



清末传统大家庭